



大学高级英语  
系列教材

英语专业研究型系列教材  
总主编 ◎ 武光军

# 新编汉英 翻译教程

武光军 ◎ 编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大学高级英语系列教材  
英语专业研究型系列教材  
总主编 武光军

# 新编汉英翻译教程

A New Coursebook o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武光军 编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编汉英翻译教程 / 武光军编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6

大学高级英语系列教材 英语专业研究型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25710-5

I. ①新… II. ①武… III. ①英语-翻译-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8457 号

**大学高级英语系列教材**

**英语专业研究型系列教材**

**总主编 武光军**

**新编汉英翻译教程**

**武光军 编 著**

**Xinbian Hanying Fanyi Jiaocheng**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 政 编 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 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185 mm × 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6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35 000

**定 价** 36.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编写说明

根据编者观察，当前大学汉英翻译教材存在如下问题：1) 在编写思路方面，目前的大学汉英翻译教材大都没有按照实际的翻译过程编写，而是按词一句一篇的思路编写；2) 版式不够生动，没有做到用户友好（user-friendly）；3) 翻译练习多以文学翻译为主，而不是真实的翻译任务，实际上，学生本科毕业后从事的翻译主要是非文学类的；4) 集中主要篇幅讲解翻译技巧，忽视了翻译策略层面的教学；5) 忽视汉译英作为译入二语的过程及标准的讲述；6) 未跟上翻译职业的时代发展，如新题材、网页的翻译及翻译学科的发展（如英国翻译名家 Mora Baker 的翻译教程 *In Other Words* 第 2 版添加了“搭配”与“伦理”两章）；7) 大多数教材的写作方法是规定性的，而不是描写性的。

基于以上观察，本教材采取了创新的编写理念与编写思路，主要有以下两大特点：1) 在教学内容上，增加了翻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模块，并基于最新的翻译研究成果，做到科研反哺于教学，使翻译教学与翻译科研相融。翻译研究是日新月异的，每过一段时间我们的研究就会加深对翻译现象的认识。没有翻译科研支撑的翻译教学是无源之水，流淌不远；不能反哺于教学的翻译科研也是无本之木，难以长久。翻译教材应是翻译科研与翻译教学的最佳结合点，因此在翻译教材的编写中，我们要使翻译科研与翻译教学真正融合。2) 在教学程序上，基于翻转课堂模式，提出翻转教材理念，即先进行翻译理论、翻译知识的讲解，然后进行语篇翻译实践，最后才讲解翻译策略与翻译技巧。也就是说，应先让学生了解翻译的整体面貌，知道翻译的大体样子、正确的翻译理念、翻译的标准、翻译的学习方式等，然后再进行翻译实践。我们认为这种自上而下（top-down）的翻译学习方式更符合翻译学习的基本规律，也更有效，会防止学生走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弯路。同时，这种翻转教材理念也符合当今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最新趋势。

本教程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包括：第一章 汉英翻译的基本知识、第二章 汉英翻

译的过程、第三章 汉英翻译语篇实践；下编主要包括：第四章 汉英翻译的主要策略、第五章 汉英翻译常见错误例析、第六章 汉英翻译名家经验谈。

当然，也有老师和学生偏爱传统的汉译英教学模式。通过调整顺序，也可使用本教程，即先讲第四、五、六章，然后再讲第一、二、三章。

本书中的部分照片来自百度等，“第六章 汉英翻译名家经验谈”引用了程镇球、王弄笙、刘士聪等翻译名家的文章，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2018年5月

# 目 录

## CONTENTS

### 上编

<b>第一章 汉英翻译的基本知识</b>	003
第一节 “翻译”的由来	003
第二节 汉英翻译简史	005
第三节 我国学生汉译英学习的基本性质：译入二语	013
第四节 汉译英的标准	017
第五节 汉译英翻译能力	024
第六节 汉英翻译中的问题	026
<b>第二章 汉英翻译的过程</b>	029
第一节 狹义的翻译过程	029
第二节 广义的翻译过程	033
<b>第三章 汉英翻译语篇实践</b>	045
第一节 应用文翻译	046
第二节 中文商务、经济类文章的英译	057
第三节 中文政治、外交类文章的英译	068
第四节 中文法律类文章的英译	073
第五节 中文新闻类文章的英译	082
第六节 中文文学类作品的英译	088

## 下编

<b>第四章 汉英翻译的主要策略 .....</b>	<b>101</b>
第一节 汉英词汇差异及汉译英策略 .....	102
第二节 汉英词汇搭配对比与汉译英策略 .....	123
第三节 汉英句法差异及汉译英策略 .....	131
第四节 汉英语篇差异及汉译英策略 .....	143
<b>第五章 汉英翻译常见错误例析 .....</b>	<b>169</b>
第一节 注意英语使用的准确性 .....	169
第二节 汉译英中的冗余词 .....	171
第三节 如何避免中式英语 .....	177
<b>第六章 汉英翻译名家经验谈 .....</b>	<b>181</b>
第一节 程镇球：汉英翻译问题 .....	181
第二节 程镇球：政治文章的翻译要讲政治 .....	186
第三节 王弄笙：外事汉英翻译的几点体会 .....	194
第四节 王弄笙：汉英翻译中的 CHINGLISH .....	203
第五节 刘士聪：写好英语句子——永远的基本功 .....	210
第六节 刘士聪、高微：关于“学地道英语” .....	213
<b>主要参考文献 .....</b>	<b>221</b>
<b>参考答案及参考译文 .....</b>	<b>223</b>

# 上 编

- 第一章 汉英翻译的基本知识
- 第二章 汉英翻译的过程
- 第三章 汉英翻译语篇实践





# 第一章

## 汉英翻译的基本知识

### 第一节 “翻译”的由来

根据《翻译文化史论》(王克非, 1997: 1), “翻译”二字由来的简单历史如下: 翻译之事, 由来已久, 古籍中早有记载。《礼记·王制》篇中说, 中国“五方之民, 言语不通, 嗜欲不同, 达其志, 通其欲……北方曰译”。之后, 佛教译者在“译”字前加上“翻”字, 遂有“翻译”一词, 沿用至今。

香港学者孔慧怡(2005)在《重写翻译史》中对“译”“翻”“翻译”三个词的由来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考察。在我国历史上, “译”“翻”“翻译”这三个词并不是同时出现的, 而是有先后顺序, 其顺序为: “译”→“翻”→“翻译”。以下是孔慧怡(2005: 19-23)对“译”“翻”“翻译”这三个词溯源的部分摘录。

#### “译”

有关中国古代翻译活动的记载, 现有的翻译史书和资料都溯源至周代政府的对外事务, 而最常引用的文献是《周礼》和《礼记》。其中“译”字作为政府外事工作的一部分, 《礼记》列为职官编制的一种: “五方之民, 言语不通, 嗜欲不同, 达其志, 通其欲, 东方曰寄, 南方曰象, 西方曰狃鞮, 北方曰译。”

在古籍之中, “译”字用来代表各种翻译活动和方法, 既可以指笔译, 也可以指口译; 既可以指译音, 也可以指译义。我们到底如何理解活动的详情, 只能看上下文来判断。以“译”字覆盖不同翻译活动和不同翻译方式, 不但不足以应付比较深入的讨论或技术性的叙事要求, 而且如果翻译活动兴盛, “译”字作为名词、动词、职衔或工作人员不断在文中出现, 就会破坏行文的流畅(此乃主流文化的大忌)。在主流文化并不关注外来事物的情况下, 大而化之的“译”字不会让一般人感到有不足之处, 但一旦翻译活动在某种层面或某种圈子里产生量和质的变化, 引起较深入和带有技术性讨论的需要时, 一个多功能的“译”字就不足以应付了。中文出现另一个代表语际

转换的字——“翻”——也正是这个原因。

### “翻”

“翻”字用作翻译的意思，起源于中国第一次大型文化翻译运动——佛经汉译。它和“译”字有两点重要的分别：1. 不作名词使用；2. 只代表译义，不代表译音。这两点都显示，“翻”字着眼于语际转换过程，特别是语意的传达。玄奘所说的“五不翻”，最能显示“翻”与“译”的分别：“不翻”，就是不译义，只译音或写音。由此“翻”字专指译义，显而易见。

“翻”字进入主流，是隋代的事，虽然仍然只用于佛经翻译活动，但随着政府致力监管佛教事务，佛教词汇也因此纳入官方语言，最好的例子莫如隋代政府所设的“翻经院”；此名唐代也沿用。还有隋代“翻经学士”，唐代“翻经大德”等头衔。这都说明，就佛教领域而言，“翻”字作为语际转换的动词已确立了。通过政府与佛教的种种关系，到了唐代，“翻”字的使用量明显提高，不但和“译”字达到相辅相成的程度，而且在佛学圈中有时比“译”字用得更多。

### “翻译”

“翻译”一词在主要佛教典籍中出现，似乎以《出三藏记集》为先，但全书只见此词一次。比《出三藏记集》成书稍晚的《高僧传》（成书约在530年），不但以“翻”字代表翻译的次数较《出三藏记集》多，而且也较多用上“翻译”这个双音节词，总数共8次。例如：“舍利弗阿毗云，以伪秦弘始九年出书梵书文，至十六年翻译方竟。”

至于，“翻译”这个双音节词如何逐渐脱离佛学范围，进入汉语主流，我们可以用二十五史为探讨的基础。下面列出“翻译”在各朝断代史出现的条目数字：《隋书》：2；《旧唐书》：8；《宋史》：1；《元史》：3；《明史》：1；《清史稿》：83。

二十五史在《隋唐》以前未见“翻译”一词，此词进入汉语主流在隋、唐之世。由此可见，《隋书》及《唐书》中所有用“翻译”一词的地方，都和佛经翻译有关，而政府翻译事务则只用“译”字。但到了《元史》，“翻译”就不再限于佛学了。例如元代翰林学士阿鄰帖本儿“善国书”（即蒙古文），“翻译诸经”（指儒家经典）；资善大夫“鲁直班则为翻译”（指在元代儒家经筵为皇帝充当传译），可见“翻译”一词已推展到佛学以外的范围，而且用以代表笔译和口译两种工作。

到了清代，“翻译”一词已完全确立，既用作动词，亦用作名词，政府官员和外国驻华使馆译者都以“翻译”为职称，是其站稳主流地位的最佳佐证；而“翻译”一词在《清史稿》的出现频率激增，更是此词在20世纪占领主流位置的好证明。

由此可见，“翻译”二字在我国历史上有着上千年的漫长演化史。“翻译”二字最早出

现于佛教翻译中，到了清代才完全确立为今天我们所称的翻译的统称。了解“翻译”二字在我国的历史发展，将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我国语境下的翻译内涵。特别是“翻”字着眼于语际转换，尤其强调语意的传达，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此外，我国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1985：2）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也讨论了“译”的来源，现摘录如下：

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囙，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囙’，读若‘譌’。”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所施的引“诱”，“譌”、“讹”、“化”和“囙”是同一个字。“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ni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难于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

在此，钱钟书先生不仅探索了《说文解字》中“译”的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还由此阐发了翻译能起的作用(“诱”)、难于避免的毛病(“讹”)和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当然，钱钟书先生在此所讲的主要是文学翻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翻译”二字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不仅仅限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直译和意译，还应包括各种形式的摘译、编译等。因此，翻译也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更重要的是其作为文化沟通和交流的桥梁。

### 练习题：

1. 查阅英语中 translation 的词汇来源及具体含义。
2. 思考并总结你所理解的“翻译”二字的含义，特别是“汉译英”的含义。

## 第二节 汉英翻译简史

1275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遍游中国各地。回国后，由他人整理出版了《马可·波罗游记》一书。根据谭载喜（2000：196）的考察，这是西方第一部以第一手材料介绍中国的著作；可以说，西方在较大范围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到了16世纪末，中国作品开始被人译入西方。据马祖毅在《中国翻译简史》中的考察，现存最早的中国书西译本是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 1543–1607）译成西班牙语的《明心宝鉴》（马祖毅，1998：298）。早期的汉籍外译的译者主要是耶稣会士。虽然他们最初都是欧洲各殖民帝国的先遣队，但在当时中国与欧洲正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下，耶

稣会士竟成了中西两大文明交流的中间人（马祖毅，1998：302）。

下面，我们将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英译、中国文学著作的英译及中国自然科学著作的英译三个方面简述我国的汉英翻译简史及我国汉籍外译的影响。

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英译方面，最重要的当推中国儒家经典的英译，即“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包括《诗》《书》《礼》《易》《春秋》）的英译。在“四书”“五经”中，《论语》最具代表性，不仅在中国影响深远，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目前，《论语》已被译入六十多种语言，其中英译本的数量最多。据李钢（2012）的考察，《论语》最早的英译本出现在17世纪末，是从拉丁文转译而来。目前尚存的早期《论语》英译本有1809年在印度传教的英国人马歇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翻译的*The Works of Confucius*第一卷。此后，上百位西方传教士、西方汉学家和海内外华人都翻译过《论语》。在经书中，《诗经》和《易经》的英译本较多。

“四书”“五经”的英译首先主要是由明清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完成的。在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西方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在儒家经典的英译方面，我们不得不提的是赫赫有名的英国第一代汉学家和翻译家理雅各。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是一位杰出的来华传教士和汉学家，他出生于英国苏格兰的一个非国教家庭，于1835年获得阿伯丁国王学院文学硕士学位，在加入基督教公理会后，曾一度进入伦敦的海伯里神学院学习神学。此时理雅各便萌生了到国外做传教士的想法，21岁时，理雅各便向伦敦会提出申请，于1838年加入伦敦会，在伦敦会的安排下，理雅各师从伦敦大学的汉学教授基德（Samuel Kidd）开始学习汉语，不久理雅各便在伦敦会的派遣下赴马六甲出任英华书院院长。在此过程中，理雅各不但未中断汉语学习，还将一些基督教资料翻译成中文，并且立志要将中国的“十三经”翻译成英文。1842年《南京条约》使得英国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次年，理雅各便将英华书院迁至香港，此后的30年里，理雅各曾因身体原因三次回国，除此之外都是在香港度过。在港期间，除了传教，理雅各还改革香港教育、出版报刊，但最引人瞩目的成绩莫过于对《中国经典》的翻译。理雅各于1858年制订了具体的翻译计划，经过20年不辞劳苦的工作，他的鸿篇巨制《中国经典》于香港发行第一版，于1861至1872年间陆续问世。《中国经典》分五卷共八本，分别为：卷一《论语》《大学》《中庸》（1861年）、卷二《孟子》（1861年）、卷三《书经》（两本，1865年）、卷四《诗经》（两本，1871年）、卷五《春秋左氏传》（两本，1872年）。《中国经典》译文的出版奠定了理雅各在汉学研究中的地位，使其成为首届儒莲中国文学国际奖的获得者，并为他赢得了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的席位。之后理雅各离港赴职，无暇监督印刷事宜，因此卷六《易经》和卷七《礼记》未能收进《中国经典》，而是分别在1882年和1885年被收进缪勒（Max Muller）主编的《东方圣典》丛书。理雅各的英译以精确著称，至今仍被西方奉为“标准译本”。例如，1871理雅各《诗经》英译本正文之前的绪论长达182页之多，内容包括五章。第一章介绍孔子对《诗经》的贡献，理雅各对“孔子删诗”

说表示怀疑，并举出例证，说明在孔子之前《诗经》就已经编纂成集，而非司马迁所说的孔子以礼义为标准将《诗经》从3000篇删定成了305篇，在他看来，孔子对《诗经》最大的贡献在于“让弟子了解学《诗》的重要性，并将其保存下来”(James Legge, 1871: 7)。另外，理雅各还对“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四家诗进行了讨论，附录部分为理雅各从沈德潜《古诗源》中选取的43首古诗的译文；第二章介绍了《诗经》研究的历史，包括《诗经》的搜集以及传播、《诗经》的作者、诗序等问题，附录部分是理雅各翻译的大序（即《毛诗》在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概论全经的大段文字）和小序（即列在各诗之前，解释各篇主题的文字）以及部分的《韩诗外传》，除此之外，还按著成时间顺序将《诗经》中的诗歌排列成表；第三章介绍了《诗经》的语言特色，对《诗经》的韵律、古汉语的发音和韵律种类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对《诗经》的诗学价值和写作特点等问题进行探讨，附录中选译了各种格律的中国诗作为对照；第四章介绍了《诗经》时代的中国社会，包括周朝的疆域、政治、宗教以及社会现状，附录是法国汉学家毕奥（M. Edouard Biot）研究《诗经》中所描述的中国社会风俗的文章；第五章列举了参考书目，中文部分共55个条目，包括郑玄《毛诗故训传》、孔颖达《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康熙帝命王鸿绪等撰写的《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以及王韬手稿《毛诗集释》等等，此外还列举了《诗经》的其他语言译本以及相关研究资料。因此，可以说，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是儒经英译至今仍无法逾越的一座高峰。

在中国文学著作的英译方面，我们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我国古典文学的译介，二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根据马祖毅、任荣珍（2003: 223—225）的考察，在18世纪英国翻译的第一部中国古典小说是《好逑传》。同时，《好逑传》也是第一部传入欧洲的中国古典小说。实际上，英国《好逑传》的英译本并不是从中文原文直接翻译为英文的，而是由法文版转译过来的。《好逑传》是我国明末清初的白话长篇小说，共十八回。内容是写男女主人公铁中玉和水冰心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侠义行为和婚姻故事。这本小说在我国当时并不属于名著，却被偶然地译介到了英国。由此可见，直到18世纪，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中的译介是非常落后和不严谨的。直到19世纪后半叶起，中国文学才从真正意义上被译介到英语世界。在这一时期，较早进行中国文学翻译的是剑桥大学的第二任汉学教授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1873年，翟理斯出版了第一部汉译英作品——《两首中国诗》（*Two Chinese Poems*），其中收录了韵体《三字经》和《千字文》的英译文。1878年，翟理斯完成了蒲松龄《聊斋志异》的选译工作。翟理斯翻译了其中164则故事，迄今为止，仍然是最全的一个英译本。1883年，翟理斯自费印刷了一本《古文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在这本书中，翟理斯翻译了不同时期中国著名散文作家的散文片段。1898年10月，翟理斯又出版了一本《古今诗选》（*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其中选译了大量中国古诗。由于其杰出的翻译成就，翟理斯于1897年和1911年两度荣获法兰西学院儒莲奖。继理雅各和翟理斯之后，英国又培养出了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汉学家和翻译大师，如阿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8—1966）、霍克思（David

Hawkes, 1923—2009) 等。阿瑟·韦利一生都未到过中国，但他翻译的《诗经》《西游记》《论语》《一百七十首中国诗》等在英语世界广泛流传。马祖毅、任荣珍 (2003 : 229) 总结了西方翻译界对这位多产的翻译家的评论，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他对所译作品的语言有很深的造诣；二是他对所译作品有透彻的研究；三是他对翻译工作热情极高。霍克思是阿瑟·韦利的学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毕业于中国北京大学，能用中文写旧体诗词。霍克思最伟大的翻译成就是将我国的四大文学名著之一《红楼梦》第一次完整地译入了英语世界，改变了以往《红楼梦》的英译本只有节译的情况，让西方读者得以见其全貌。1973 年至 1980 年，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了《红楼梦》全译五卷本，霍克思翻译了前三卷的八十回，后两卷的四十回由其女婿在其指导下翻译完成。在该英译本中，霍克思将书名改为了《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该英译本出版后立即受到普遍欢迎，并陆续再版，现已成为英语翻译文学的经典之一。《泰晤士报教育增刊》认为霍克思的译本是当代最佳英文译作之一 (马祖毅、任荣珍, 2003 : 267)。2009 年 10 月 9 日，时任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在《人民日报》发表《忆霍克思先生》一文，指出“他将中国人民最钟爱的古典小说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引荐给西方读者，为中英两国人民架起一座文化沟通的桥梁，他的贡献将永为世人铭记”。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美国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主要成就在诗歌方面。美国翻译中国古典诗词的第一部诗集是庞德 (Ezra Pound, 1885–1972) 翻译的《华夏集》(*Cathay*)。在当时，庞德并不懂中文，其翻译的许多诗歌都经过了改写和加工，并保留了中国的异国情调。《华夏集》这本仅有 18 首诗的薄薄小册子，被人称为庞德本人对文学的“最持久的贡献”，在美国现代文学中总忘不了要提及这本书 (马祖毅、任荣珍, 2003 : 350)。1965 年，美国“垮掉的一代”的著名诗人加里·斯奈德 (Gary Snyder) 出版了《砌石与寒山诗》(*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向美国介绍了唐代僧人寒山的诗作。1981 年，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欧文 (Stephen Owen) 出版了《盛唐诗》(*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1986 年，被誉为美国“翻译中国古典文学的泰山北斗”的波顿·沃森 (Burton Watson) 出版了其所编译的《中国诗选》(*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在此时期，中国的古典名著小说在美国也都有译介，但成就不如诗歌方面突出。美籍华裔翻译家王良志、王际真分别于 1927 年和 1929 年出版了《红楼梦》的节译本。1933 年，美国女作家赛珍珠 (Pearl Buck) 出版了其翻译的《水浒传》，将书名改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1937 年，杰克逊 (J. N. Jackson) 也出版了其翻译的《水浒传》，书名为 *The Water Margin*。1983 年，美籍华裔学者余国藩出版的四卷英文版《西游记》，成为英语世界上第一个英文《西游记》全译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方面，美国译者的成就更为突出，特别是在小说翻译方面。在美国，我国作家鲁迅、老舍、萧红、钱钟书、茅盾、莫言、王蒙、余华、贾平凹、张洁等的作品都有译介。英国翻译的中国现当代作家有鲁迅、老舍、丁玲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方面，我们不能不提的一位译者就是美国汉学家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葛浩文是我国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其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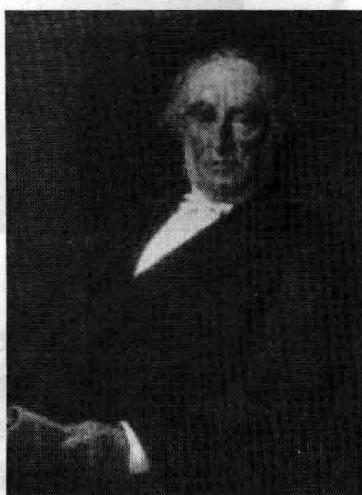


译过萧红、陈若曦、白先勇、张洁、冯骥才、贾平凹、李锐、刘恒、苏童、老鬼、王朔、莫言、刘震云、虹影、阿来、朱天文、朱天心、姜戎等 20 多位名家的 50 多部作品。葛浩文被美国著名的中国小说评论家夏志清教授称为“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

相对于文学和社科作品的英译，我国自然科学著作的英译作品数量较少。明代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可谓是中国 17 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特别是在 17 世纪后半叶传入日本后影响较大。但直到 1966 年，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出版社才出版了该大学历史系任以都和她丈夫孙宋全译出的英文版《天工开物》，题目为：*Sung Ying-hsing's Tien-kung Kai-Wu, Chinese Technolog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20 世纪初，美国米尔斯（Ralph Mills）和伊博恩（Bernard Emms Read）教授翻译了我国的药物巨典《本草纲目》的一部分。此外，我国造纸技术、地理学、农学等方面的自然科学著作也有部分英译作品，但数量不多。

当然，中国国内也对汉籍英译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在哲学和文学方面，辜鸿铭翻译了《论语》、林语堂翻译了《墨子》《老残游记》等、杨宪益与其夫人戴乃迭合译了《红楼梦》，许渊冲英译了唐宋诗词、张培基英译了当代散文，等等。在政治作品方面，我国翻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等。在自然科学著作方面，我国也英译了大量作品。在机构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汉籍外译的出版。1978 年以前，国内从事外文书刊编译和发行的出版社仅有外文出版社和新世界出版社两家。1979 年后，我国先后成立了中国文学出版社、今日中国出版社等几十家出版社从事中文作品的英译工作。

根据马祖毅、任荣珍（2003），我国汉籍外译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汉籍翻译对西方思潮的影响。我国大量典籍的外译对西方的启蒙思想家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德国的莱布尼茨、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等都认识到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价值，并从中吸取养料。19 世纪的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还在其《物种起源》等著作中引用了多条有关中国的资料，来证实其生物进化论。二是汉籍外译在世界文学领域内产生的影响。德国诗人歌德和席勒是最早发现和推崇中国文学的西方文学家。歌德在读了《好逑传》后便为中国古老的文明所倾倒。在英语世界，庞德所译的《华夏集》对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20 世纪中叶，唐代僧人寒山的诗歌的译介在美国也曾掀起了一股“寒山热”，引来美国“垮掉的一代”的诗人纷纷效仿。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是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曾任香港英华书院校长，伦敦布道会传教士。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从 1861 年到 18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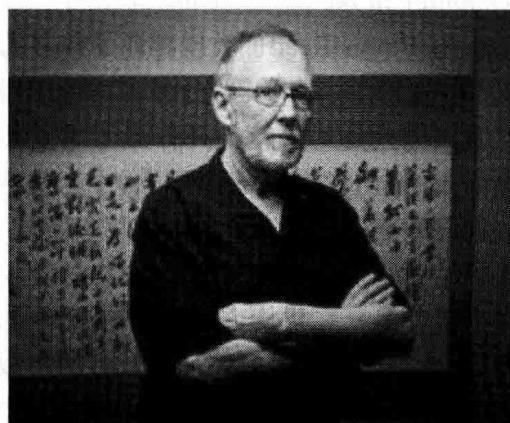
理雅各

年的 25 年间，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共计 28 卷。当他离开中国时，已是著作等身。理雅格的多卷本《中国经典》、《法显行传》、《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和《中国编年史》等著作在西方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他与法国学者顾赛芬、德国学者卫礼贤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他本人也是第一个儒莲翻译奖的获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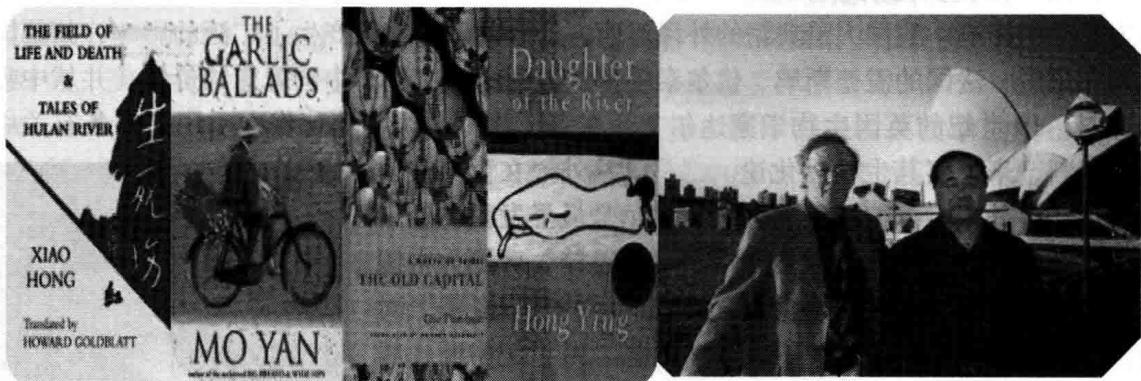
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 年 10 月 30 日—1972 年 11 月 1 日）是美国著名诗人、文学家，意象主义诗歌的主要代表人物。庞德还是一个热衷于介绍中国古典诗歌和哲学的翻译家，他自称为儒者。他改编并翻译了《华夏集》《诗经》《论语》等儒家经典。



庞德



葛浩文



葛浩文及其译作

Howard Goldblatt 的中文名是葛浩文，美国著名的汉学家，是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葛浩文出生于 1939 年，20 世纪 60 年代服役期间在台湾学习汉语，后获得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目前是英语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的翻译严谨而讲究，“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葛浩文翻译了萧红、陈若曦、白先勇、李昂、张洁、杨绛、冯骥才、古华、贾平凹、李锐、刘恒、苏童、老鬼、王朔、